

遼寧文史資料

• 第七輯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0.6

辽宁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字数: 100,000 开本: 850×1168 $\frac{1}{2}$ 印张: 4 $\frac{1}{2}$

印数: 1—4,200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鸿 宾

责任校对: 马玉德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统一书号: 11090·104

定价: 0.56元

(内部发行)

编 辑 凡 例

一、本选辑的编刊，是为了积累、保存、核正所征集到的史料，供历史研究的参考，并用以推动史料的征集工作。

二、本选辑所刊载的史料，多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内容可能不尽翔实，观点也可能不完全正确，因此，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

三、本选辑所刊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意见。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综合、删节、选录和作文字修改。

目 录

“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

.....卢广绩(1)

庄河大刀会的抗日活动.....陈士聪整理(26)

尚吉元杀寇烧厂的英勇事迹.....杨大明整理(33)

四道河惨案.....岫岩县政协文史组整理(40)

日寇血洗南岗头事件

.....姜开田、张春发口述 东沟县政协整理(46)

日寇在下露河马架子大屠杀的经过...马文杰整理(51)

日寇盲炸大雷沟、火烧歪脖哨.....(54)

“九·一八”事变北平见闻录.....惠德安(58)

东北江防舰队——东北海军史略之一.....王时泽(66)

冯德麟与“山陵守护大臣”.....李泰棻(72)

对《我所知道的杨常事件》的补充.....刘鸣九(77)

第一次接收沈阳的回顾...赵濯华、刘云鹤、张化东(90)

“五卅”惨案后沈阳市学生联合反对

日英帝国主义的斗争.....金玉清(97)

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怎样利用基督教为其

侵略政策服务.....孙鹏翥(106)

旧中国东北体育活动的点滴回忆.....刘长春(121)

国民党统治时期沈阳市的改辖和

倒徐活动.....郑作藩(133)

“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人民的 抗日救国活动

卢广绩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在北平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成立开展活动到一九三三年八月结束，在约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发行刊物、宣传鼓动抗日救国工作，指导在辽宁省的抗日义勇军的活动，曾给最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以后，虽以种种原因未能坚持下去，但在当时对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不抵抗的乱命确给以有力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我们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压迫下，决不屈服，顽强战斗的英雄气概。这段用血和泪写成的光荣历史不应使其湮没。回忆当年发起抗日救国工作的一些负责人，现在许多离开人世，唯我还幸存健在，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一段史实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但是经过这样五十余年漫长岁月，手中又无多少参考资料，仅凭个人能记忆的，又兼年迈因而遗漏和错误的地方在所难免，诚恳地希望曾同我一起搞抗日救国工作年纪稍次的同志们，能就我所写的这篇回忆录的内容给以纠正和补充，使其更能符合历史真实，这是我深切期望的。

（一）日、俄两国在东北地区的角逐，和日本 想独霸东北的概述

一八九四年，中日两国发生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对日赔款两万万两白银，同时还割台湾、澎湖

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但当时由于帝俄联合德、法两强国出面干涉，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交还中国，由中国付给日本三千万两白银。日本对此是极不甘心的。同时帝俄还趁机同中国政府签订密约，中国政府允许帝俄在东北修建东清铁路，从满洲里一直通到大连、旅顺，还把大连、旅顺租让给帝俄。当时在中国的英、美两帝国对帝俄在东北劫取这些特权认为有损于各国在华利益，也在暗中怂恿和支持日本，因此，就爆发了一九〇四年日俄两国的战争，很快日本军由辽东半岛登陆，把俄国军队打到沈阳，但帝俄不承认失败，这时美国出面调停，两国停止战争。就在一九〇五年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根本没同中国商量，以长春为界划分势力范围，长春以北划归帝俄，长春以南划归日本，所有铁路和大连旅顺关东州等地方都归日本所有。

从一九〇五年以后，日本就以南满铁路为中心，沿铁路附近的矿藏多为日本所攫取，如本溪煤铁公司、抚顺煤矿、鞍山制铁所、大连商埠等，有的是日人开办，有的虽名为“中日合办”，但所有经营大权完全操纵在日本人手里，中国无权过问。东北的统治者张作霖，虽然同日本相勾结，但他还不肯俯首贴耳甘心做日本的傀儡，听其摆布。因此一九二八年六月，日本在南满和北宁铁路立体交叉皇姑屯这个地方，安放了炸弹，当张由北京返沈阳的火车，经由皇姑屯时，炸弹爆炸了，将张炸死。那时日本就有趁机侵占东北的图谋，由于沈阳地方秩序维持很好，张究竟死否还不清楚，不敢贸然从事。不久张学良就返沈阳坐镇，才公布张的死讯，此事对张学良说，确实给他一次最深刻的教育。记得当时日本政府，特派林权助（曾任驻中国的公使）为代表，来沈阳吊张作霖之丧，实际他的使命是想阻止张学良不要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发生关系。这样就可

以对东北这个地方任凭日本来摆布，但张学良未听日本的话，在一九二八年冬毅然“易帜”，把五色国旗改换为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拥护和服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领导。

（二）成立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的经过

一九二九年以后，日本在东北各地侵占中国的土地，屠杀中国人民的事件层见迭出。当年，我们北宁铁路有条支线通往东北大学工厂，在北陵前附近有日本人经营的榊原农场，日本警宪未经中国同意，借口铁路支线影响农场的管理，就把这条支线拆毁了。拆毁以后咱们还不敢修复，后经辽宁省政府派交涉署长王镜寰同日本沈阳领事馆交涉，很久得不到解决，各界人士都为此感到愤慨。实是欺人太甚，真是令人忍无可忍，大家觉得政府这样无能，人民要起来说话，于是就由各界人士组织成立了“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简称外交协会）。

外交协会是一个人民团体。由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会员代表大会，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委员会，由委员会选举常务委员（七人）主席团为阎宝航、金恩祺、王化一三人，常务委员为卢广绩、梅佛光、李象庚、苏上达四人。委员有赵雨时、赵晋如、刘广沛、王德恩、阎模楷、陈言、卞鸿儒、曹德宣、省缘、车向忱、张大威、姬振铎、张季英、刘仲明等人。

外交协会成立后，在一次集会上曾发表宣言，内有“近百年来，帝国主义者列强挟其残暴之威焰，来临吾华，铁蹄到处，山河变色，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强迫订立，一切特权之掠夺，使我国沦于次殖民地之悲惨地位而莫由自拔。

在帝国主义集团之中，对我国压迫蹂躏尤为特甚者，则为东邻日本……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日本

警宪无理拆毁我北宁铁路支线之事件，实为刺激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之主因，迨日本七月间中东路事件之发生，各县分会也相继宣告成立，以一致之目标做共同之奋斗。”（见一九三〇年东北年鉴）

外交协会成立不久，在一两年时间内，各市县相继成立了分会，大约有四十几个市县。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又扩展到吉林，遂改称为“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协会主要活动，定期举行讲演报告会，宣传外交常识和时事，对市民和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出版一个刊物，叫《国民外交周报》，后改为《国民外交半月刊》，主要是宣传时事及外交常识，揭露日本在东北各地的侵略罪行，反映民意等。

外交协会成立后，有这么一件事：日本人从外国进口海洛英，到沈阳贩卖，毒害中国人民，一时搞得很厉害。当时各人民团体、外交协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国民常识促进会等便于邮政局取得联系。当时沈阳邮电局邮务长巴里地，他是意大利驻沈阳领事兼邮务长，一次日本人从瑞士和德国偷运进来价值百万的海洛英等毒品，被我们查出来，全部给没收了。我们公开在小河沿广场召开了一个大会，说明原由后，当众全部焚毁，当时我们曾邀请各国驻沈领事参加，只有日本领事未到。

（三）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国民外交协会派人 前往调查，对在朝鲜被害侨胞进行慰问

万宝山事件发生在一九三一年四月，由于当地朝侨在日人欺骗唆使下无理霸占中国农民大量土地，强行引水灌田，断绝中国农民生路，激起当地广大农民起来反抗。六月，该地农民曾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向日方提出严重抗议，并群起

质问朝鲜人，结果不但无效，反遭到日本警察殴打，同时捕去中国农民数十人严刑拷打，倍极惨酷，而日本反诬蔑“华人暴动，殴伤鲜人”，调动大批警察搜缴我农民枪械，百端向我方挑衅，幸我方主持镇静，未与还击，由长春外交特派员据理力争，日本阴谋遂未得逞。

但自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日本竟借机煽动授意在朝鲜各地日文报纸，出号外多次，扩大宣传，歪曲捏造说，驻在中国朝侨为中国人杀害无数，鼓动在朝鲜境内掀起“排华暴动”。在七月里，受日人欺骗、挑拨的朝鲜人在朝鲜各地向我侨胞展开猛烈攻击。日本浪人和日本军警变装改服，混入朝鲜人暴动队伍中参加劫杀，遍及朝鲜京城（即汉城）、银川、镇南浦、开城、元山、新义州各地区。特别是平壤，是为侨胞集中地点，受害最惨。暴徒数千手持武器，焚劫新、旧两市衙，华侨住宅和商店三百余家，无一幸免。计被残杀死去和抛投到大同江中约二百六十多人。重伤和轻伤男女共三百多人。这次在朝鲜境内掀起排华暴动，在七月里持续四、五天之久，侨胞死伤达数千人之多，财产损失超数十万之巨。是对在朝鲜的华侨一次空前未有的浩劫。

我们东北各级政府和国民外交协会同感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洞测日本是想借保护朝侨名义进军东北。因此，我们尽最大的克制和忍耐，设法说服当地被害农民和义愤填膺的爱国同胞，绝不对驻在中国朝侨采取报复行动。因此，日本阴谋未能得逞。国民外交协会当时对万宝山事件作过调查，并派员至朝鲜慰问被害侨胞，关于调查和慰问的详情，我过去写过材料，在此不详叙述。

(四) 在北京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沈阳事变，是日本有计划有预谋搞起来的。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日本很快的占领沈阳。当时全市商店停业，市面混乱，我那时是沈阳市商会副会长，为维持秩序就同会长金恩祺两人去日本领事馆，过去我们去时，总领事都是亲自接见，但这次去就不同，派一个副领事来应付，说事件是：“军人行动，我们没办法”并表示“将来要成立一个地方维持会，还需要你们帮忙”。二十日这天日本就占领了沈阳市总商会，查问：“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在哪里？”因外交协会是设在商会内，我们感到留在沈阳是危险的，这天晚上我和金恩祺就住在英国朋友英牧师家里，阎宝航也未回家住在施医院。二十一日那天早晨，我同阎、金三人由英牧师和美国朋友麦尔斯同坐一辆汽车，挂上英美国旗，通过日本几个监视哨到皇姑屯车站，这时日军还未顾及到皇姑屯，我们便乘坐去关内的难民车去北平。

到北平第二天，我们往见张学良，他表示南京政府有命令不让抵抗，我们当时很气愤地同他辩论，讲道理。国家养兵是对外捍患御侮的，过去打内战，现在有机会对外为什么不打？张学良那时患病刚愈，身体不太好，他个人也有一些“恐日病”，又说没有准备打不了。结果意见不一，不欢而散。

过几天，由东北逃到北平的人越来越多。就在九月二十七日那天，不期来到奉天会馆（在旧刑部街）的人，有四、五百人。大家议论纷纷，群情激愤，质问：对日本的侵略，政府为什么不抵抗，不明白是什么道理。大家认为政府不管，我们人民应该有所表示，特别是我们东北人民不应缄默。一致要求成立抗日救国组织。立时召开一个大会，开会时，因我是原沈阳

市商会副会长，推举我做大会主席，经过商议，决定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这个组织（以下简称救国会）。参加会议的各方面人士都有。当时还没感到谁是哪个阶级、哪个党派的问题。共同感到的是家乡都丢了，逃到关内只有一致对敌。所以会开得很顺利，并发表了宣言。

救国会由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十一人。由执委会选出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九人，常务委员会下设三个组：总务组由金恩祺、卢广绩任正副组长，以后由高崇民任副组长；政治宣传组由阎宝航、车向忱、李梦兴任正副组长；以后有杜重远、霍维周担任；军事组由王化一、熊飞、彭振国任正副组长。执委中有高崇民、梅佛光、卞宗孟、苏上达、吴焕章、黄剑秋、王捷侠、陈先舟、霍维周、徐仲航等。在会内工作的有许多是东北大学和中学学生，以及原政府机关来北平的职员。记得有宋黎、张希尧、郑鸿轩、张雅轩、宁匡烈、高鹏、纪亭榭、赵长泰、潘赓祺、黄宇宙、魏兴华、徐静远、郭历吾等人。当时在救国会工作的人，最多时约数十人，做宣传联系关内外和参加抗日义勇军等工作。他们出生入死、冒险犯难，后来除牺牲者外，许多人走向进步的道路，有的参加了共产党，不少人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贡献。

救国会成立后，东北青年学生逃到北平的近万人。我们成立了东北学院（后改为东北中学）进行收容。由王化一、李梦兴负责。东北大学也在北平复校。收容东北大学学生。学校除学习外都进行军事训练，又抽出一部分学生组成军事训练班，即学生军。东北逃到北平的抗日家属和难民也很多，把他们收容起来，成立“东北难民教养院”。地址在郁文大学旧址。最多时有四、五百人。在院内办有手工工厂、小学校、幼儿园等。教养院成立后由我任院长，委由侯敬民负责全面院务，侯本人认

真负责，但因收容的人成份复杂，加之管理上又严一些，引起一些人对侯不满，造谣滋事，后经整顿清除一些坏人，秩序渐好。到一九三五年在我出国后由车向忱继任院长职务。

在宣传工作方面，除了组织宣传队沿平津、平汉等铁路线扩大宣传外，又在北平、天津、上海为宣传重点地区，曾派王化一、侯静运等到平津各大学，阎宝航到南京上海各地报道“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活动的情况，同时我们救国会，还刊有《救国旬刊》、《复巢月刊》与《东北通讯》等宣传刊物。

救国会为了培训宣传联络人员，由政治宣传部责成车向忱、张希尧同志在北平西山集会。从青年学生中选出百余人给以短期训练，然后派到东北各地做宣传联络工作。抗日义勇军建立后又把这些青年派到各路义勇军中去，做政治宣传工作，并同救国会取得联系。

自一九三二年开始，辽宁各地先后建立了各路抗日义勇军，为了使各地义勇军同救国会保持密切联系，由救国会委托委员陈先舟同志特培训一批无线电报务人员数十人。同时由陈先舟委员负责采购无线电器材，在救国会内设立无线电总台，同在辽宁各地义勇军电台联系，随时向救国会报告义勇军活动情况。

（五）救国会经费的劝募和筹措

救国会成立后，开展工作需要经费。钱从哪里来？开始是由负责人向各处联系捐募。刚成立时我们找过北宁铁路局局长高纪毅和北平市公安局长鲍毓麟，两人各捐给二百元。救国会开始了工作。随后又向我们相识的有关方面劝募，先后筹到千余元。工作开展后，需派人到关外去联系以及做些宣传工作，这些钱很快就用光了。有一次我们去找北平市周大文市长，过去在

东北我们虽都相识，但这次他根本不接见，对救国会根本不理睬，使我们很感惊奇，这件事我至今未忘。北平西山有个香山慈幼院，院长是熊希令老先生，他曾参加过“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曾受到清政府降职处分。他虽是旧官僚，但很进步，我们去找他，他很支持，捐了不少钱（数字记不清），还有八道壕煤矿局长王正铺（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之弟）及寄居在东北当过官的王顺存老人等一些人也捐给救国会一些钱。

我们成立救国会，在政府里和张学良部下的有及少数人，认为政府都没办法，你们这些人鼓噪、喊口号，日本就怕你们吗？认为一点没有用。不同意我们搞救国会的工作，特别是张学良部下有一位秘书长王树翰，他就不同情我们搞救国会，但我们常有来往，彼此都很熟识，在筹款时，有一次我去看望他，见他怒气冲冲，未敢向他讲话，随后才知道是因这样一回事：一九三一年长江发大水、武汉被淹，各地都有些捐款。在北平的东北行营也捐募一些款，行营参谋长戢翼翘没经张学良批示，也未同王树翰商量，就把捐款三十万元直接电汇武汉，因此王大为不满。认为这么大的款项不经张学良批准，起码应同秘书长商量才是，王正在发火时我进去了，他便问主管会计：“汇去三十万元还剩有尾数没有？”会计告知，还剩一万四千元。王就对我说：“你们搞救国会不是没钱吗，把这一万四千元我批给你们救国会。”我们正愁开展工作没钱的时候，得到了意想不到的一笔款，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这时，杜重远同志由救国会派驻上海，以便同上海抗日救国各团体取得联系。他们应许给救国会以支援，电约我们前去接洽，我同阎宝航两人去上海，正赶上上海十九路军赶来抗日，就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我们是在一月二十七日晚到达上海的，我们离北平时还不知道上海要有战事，到上海车站一下

车，就感到形势很紧张，要打仗，果然第二天早四点上海抗日战争就打起来了。我们被围在那里。那时闸北租界、北宝山一带都是日本驻军，十九路军蔡廷楷、蒋光鼐、翁照垣几位将军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尊敬。上海各界集中力量积极支援抗日十九路军，因上海抗日战争起来，我们再要求上海支援就成问题，最后由朱子樵将军筹措一万元电汇北平，我和阎宝航两人留在上海一星期左右，趁双方炮火皆停时，乘英轮闯出黄浦江，北返北平。

我们成立救国会，事先并没有向张学良请示，但他也未阻止我们成立。他以后看到锦西民团消灭古贺联队的喜讯，又看到辽宁各地警察和保安队的领导人不断来北平向他请示要求抗日救国。他表面当然还是表示不抵抗，怕说违犯南京政府不抵抗命令，但实际上对有些行动他是给予支持的。如救国会对辽宁各地抗日义勇军的支援和联系以及与吉黑两省抗日将领的联系，他都配合救国会给予支持，我们也随时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特别是在北平市，由边业银行经理韦梦龄建议，为解决救国会经费，在北平市发行爱国奖券，每月出一次奖，每月可收到二、三万元，作为救国会的固定经费。发行爱国奖券一事也是经张学良批准的，这是对救国会的最大支持。

（六）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

救国会成立后，同年十月间，看到国民党政府一味依靠国联，毫无抗战准备，到北京的东北各界人士极度气愤，十一月的一天，在北京西单一带、“奉天会馆”所在地，青年学生不约而聚的就有五、六百人，他们一致要求救国会督促政府出兵东北抗击日本侵略者。于是就决定组织一个赴京请愿团。首先成立一个指挥部，由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冯庸、卢广绩等人负责，带

几百人，决定先去上海，后转南京请愿，因那时国民党里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几个领导人还不和，正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南京方面听到消息，曾给张学良打电话令他劝阻，也令铁路局不给挂车，那时适有一列车正要开行，许多学生卧轨阻止，同时青年学生向乘客进行宣传。许多旅客深受感动，自动让出列车，并有许多人参加了请愿团，我们就乘坐这一列专车南下。

十一月七日到达浦口，下车后乘轮渡过江转车去上海。上海方面听到我们请愿团来，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江向涣先生、陈立廷先生（上海青年会总干事）以及上海各界爱国团体到车站迎接，把我们安置在中华职业学校和几个中学里。到上海后，一方面我们组织游行宣传，曾闯入英租界，租界里印度巡捕并没有阻止我们的行动，只是监视；另一方面，我们几个领导人分别去见汪精卫和胡汉民，汪很会说漂亮话，对所问，不着边际只表示同情，说什么政府里我说话还不能算，意思是叫我们到南京找蒋介石。见到胡汉民，他刚被蒋介石关了一年才放出来，精神不正常，见我们时戒备森严，讲什么张学良没有能力，东北丢了他也有责任等等。特别使我们气愤的，他说：“国家的强弱，不在疆土的大小”意思是东北领土要不要都可以，简直不象一个国家领导人说的话。这个人很顽固，是国民党的右派，于是我们不得不转赴南京。

十一月十日回到南京，住在金陵大学，第二天我们请愿团就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由中央委员吴铁城、张继接见，对我们讲：“学生要好好念书，政府自有办法”，言外之意，国联正要进行调查，用此进行敷衍。那时王化一代表请愿团讲了一些话，希望政府负起责任出兵东北。当时已到中午，传说蒋介石正在中央军校，大家决定不吃午饭，立即转赴中央军校。走二、三个

小时才到，又等一个多小时蒋介石才出来接见。高崇民代表请愿团讲：“东北人民对得起中央，中央有困难时，帮助政府抵制了阎、冯，促成中央统一，现在东北有困难，政府应该出兵。”慷慨激昂的讲话，使蒋介石多时讲不出话来，最后就说政府有办法，特别提到国联调查团快要来中国，能够公平解决，不行的时候政府一定有办法等等。我们到后，天津请愿团也赶到这里，蒋就对他们讲：“东北丢了，他们请愿还可以，你们天津来凑趣干什么？”天津代表激愤地说：“东北是中国的领土，全中国人民都有责任，我们来请愿有什么不对，你们政府是管什么的？”把蒋介石促个闭口无言，转身回去，不多时又出来讲几句话，弄得蒋很尴尬，我们请愿团也不得要领而返回。

我们住在金陵大学，这天夜里，十一、二点钟，警察来了，突然进行检查，竟说我们这里有共产党撒传单。我们指挥部根本不清楚这件事，也未看到什么传单。最后也未检查出什么，对此我们非常气愤，曾严厉质问当地国民党党部和政府：“我们向政府请愿有什么罪，这样对待我们，拿我们当罪犯来检查，这是为什么？”当我们返回时，中央军校二、三百名东北籍学生有组织的到车站去送我们。我们沉痛地斥责政府对请愿团野蛮的检查行为，因同乡关系，过江时，许多人落了泪，同感亡省亡家之痛，这使我记忆犹新，迄今未忘。

（七）救国会与张学良的关系

我们组织救国会，事前并未请示过张学良，但他也未对我们干涉。救国会常委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在沈阳时国民外交协会和各人民团体的领导，这些人过去都同张学良有关系，当时我们这些人到北平后，都没有正式工作，他还是想法照顾我们。就成立一个“东北问题研究委员会”的组织，聘我们这些人

委员，主要负责人则是对日本较熟悉的一些人，有王芑生（国民党人）、王卓然等。委员会不定期开会，探讨东北问题，每人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当时北平处于军事状态，但在南京政府看来，日本虽已占领东北，并未觉得有什么战时紧张之感。记得那时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或是秘书长）魏道明来平，住在北京饭店，同来的还有一个他相识的郑毓秀女士（上海法院院长）。因为是中央来的人，张学良就给予招待，整天一同跳舞玩乐，我们感到张学良处在这个环境，东北家乡都丢了，国难当头还扯这套。救国会就派徐仲航（上海法学院学生）去找郑，代表救国会向她募捐，魏、郑经这样一促，也就很快离开北平，张学良对救国会这一行动并未表示特别不满。当时顾维钧（做过北洋政府外交部长、国民党时期为驻美大使）住在北平。张也经常到顾家去玩（打麻将等），顾维钧夫人很警惕，知道救国会对魏的事，就拒绝张去，怕救国会的人到他家去闹，象当年“五四运动”时学生到曹汝霖家去那样。张知道以后，只是说：“你们管得太宽了”，并未特别感到不满意。此后，日文报上报道辽西民团消灭古贺联队并打死联队长的新闻，同时辽宁各地警察以及保安团队领导人接连来北平要求进行抗日，以及国联调查团要来东北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就同我们进一步取得联系，给予配合和支持。如救国会派黄宇宙等人去辽东策动唐聚五起来抗日，车向忱去江省会见马占山将军，除拿救国会的信件，同时也拿张的手谕，起到一定作用。因张过去是东北最高领导人，各方面还是很尊重他的，也听从他的指挥。辽南义勇军司令李纯华来北平请求武装，张答应给不少武器弹药，在这批武器运到后，辽南的义勇军在关门山战役中取得巨大的胜利，又如救国会的经费开始靠募捐，时断时续，影响工作，张同意在北平发行爱国奖券后，才得以解决。救国会在北平，也难